

新加坡與中共之政治經濟關係

顧長永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一般而言，兩國建立邦交是一件大事，值得大肆慶祝一番。可是，當新加坡與中共於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建立邦交時，雙方並未大張旗鼓。這對於熟悉新加坡及中共關係發展的觀察家而言，並不驚訝，因為雙方在未正式建立邦交前，已經建立了相當良好的政治及經濟關係。

就政治關係而言，新加坡與中共的高層官員一直保持著相當良好的溝通管道，這種流暢的高層對話，甚至比一些有邦交的國家還要更好。例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曾經在任內四度正式訪問中國大陸；而中共的高層官員如鄧小平、趙紫陽、黃華、錢其琛等都曾在過去的二十年內先後訪問過新加坡。就雙方的經濟關係而言，新加坡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起，即一直是中共在東南亞的最大貿易伙伴；亦是中共在世界上的第六大貿易國；此外，新加坡還是中共的第五大投資國。以中國大陸而言，它也一直是新加坡的七大貿易伙伴之一。中共及新加坡的雙邊貿易額從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的美金六千六百二十九萬元，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美金六億一千零七十六萬元。一九八九年，更增加到美金三十一億九千零一十三萬元。

新加坡既與中共有如此密切的政治及經濟關係，為何沒有在早些時候（如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就建交呢？^①為什麼一個像新加坡的小國家，會和中共發展如此密切的關係？為何一個像中共的區域性霸權，願意付出如此多的關注在一個小島型的國家？在雙方沒有正式建立邦交的情況下，新加坡與中共是如何建立起一個甚至比有邦交國還要更好的關係呢？本文將從新加坡的角度，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首先將研討新加坡對中共發展關係的三個要素，其次將介紹根據這些要素，新加坡及中共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政治及經濟關係的發展及轉變。新加坡與中共在過去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雙邊關係，在一九〇年代這種關係仍將持續成長。

註① 中共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先後與東南亞國協的三個國家建交，即一九七四年首先與馬來西亞建交，一九七五年與菲律賓及泰國建交。

貳、新加坡對中共關係發展的要素

共黨問題，區域的政治考量及新加坡特有的外交性格是三個新加坡對中共發展關係的重要因素。

一、共黨問題

共黨問題可能是新加坡沒有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就與中共建交的最大考慮，這與中共對東南亞的共黨政策息息相關。新加坡雖然係東協各國中，受共黨威脅最少的國家，但共黨作亂的威脅始終存在。^②

新加坡及東協各國對中共最不滿的，就是其以「黨對黨」的政策來支持東南亞的共黨活動。即使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當大馬、菲律賓及泰國與中共建交後，中共仍不放棄其「雙重政策」，即「政府對政府，黨對黨」。在這同時，新加坡及其東協盟國亦不斷要求中共停止援助當地的共產黨。例如，李光耀在一九七六年首度訪問中國大陸時，就對中共領導人明白指出：「……至於新加坡政府如何對付其內部的共產黨，是新加坡政府自己決定的事情。」^③這句話明顯的告訴中共不必干涉新加坡內部的共黨問題。李光耀在一九八〇年訪問中國大陸時，又再度提及此問題。東協各國領袖亦曾多次向中共提出類似的要求。

很可惜，中共對此種「不干涉內政」的要求，均相應不理。例如，當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訪問東南亞時，就表示不願放棄中共的「雙重政策」。一九八一年當趙紫陽訪問東南亞時，他也未表示願意放棄「黨對黨」的政策。^④一九八四年當吳學謙訪問東南亞時，亦被問及此一問題，吳未作正面回答，反而重覆申明中共對外關係的和平五原則。^⑤東協各國為此而對中共深表不滿，這種不滿的情緒，直到一九九〇年八月當李鵬訪問東南亞時，才稍得到疏解。當李鵬在大馬受到馬哈迪（Dr. Mahathir）總理的熱烈歡迎之際，在記者會上，李鵬強調中共願與東協各國加強經濟合作關係。更重要的是，李鵬表示中共不會利用華僑為中國大陸謀取任何政治利益，並且強調中共目前沒有和東南亞的任何共產黨來往，包括大馬及新加坡政府最關切的馬來亞共產黨。^⑥新加坡及東協各國當然非常高興聽到中共的這項官方聲明，因為新加坡境內亦有許多馬共的活躍份子。李鵬為了進一步向東協各國示好，並主動表明中共對爭執已久的南沙群島的態度；他說：「中國準備和東南亞國家合

註② 新加坡早期的左派組織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cialists）雖已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被禁，但共黨的活動始終未曾停止過。特別是馬來亞共產黨份子，經常藉各種方式在新加坡從事挑撥性的政治活動。

註③ 譯自 Harvey Stockwin, "Tee lays it on the lin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中文簡稱FEER), 4 June 1976, p. 14.

註④ Anne Summers, Indira blackbills Zia, *FEER*, 9 October 1981, pp. 8-9.

註⑤ 此五原則為互相尊重對方的主權及領土完整性，互不侵略，不干涉對方國內事務，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存。

註⑥ 中共問題資料週刊，第四四九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四頁。

作開發南沙群島，而把主權問題暫時放在一旁。⑦

由此觀之，中共目前對東南亞的政策，已由早期的支援共黨運動轉變成現在的發展經濟合作關係。然而，中共却花了近四十年的時間才放棄已往的政策，及接受共黨運動無法在東協各國成功的事實。但是，東協各國，對其境內的共黨活動仍保有相當高的警覺。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子。新加坡自一九五九年頒佈國內安全法（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以來，即可以不經審判過程，而逮捕及拘禁人犯。這種嚴格的政策，從以前到現在都未曾放鬆過。例如在一九八七年中期，國內安全部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二十二位受英語教育的專業人士。他們被控訴陰謀藉著馬克思組織，而滲入天主教會，一個影劇公司，工黨（反對黨），及法律協會。⑧之後，李光耀總理對國內安全部的舉動給予相當的支持，他強調其支持不經審判而逮捕及拘禁人犯的一貫立場，並表明他無法容忍任何方式的外國勢力介入新加坡的內政。⑨

然而，當最近中共改變其支援東南亞共黨的政策時，新加坡亦稍微放鬆一些其對共黨的強硬政策。例如，前所述的二十二位拘禁者，不久即大都得到釋放，而其中的一位律師Teo Soh Lung亦於一九九〇年六月有條件的釋放；目前唯一仍被拘禁的是Vicent Cheng。此外，自今年（一九九一年）一月起，一些在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被放逐流亡在外的左傾政治人物（包括一些馬共份子），被允許可以再回到新加坡。但是，這項放鬆的規定，並不適用在七〇年代以後才被放逐在外的政治人物，因為至今他們仍未被允許可以入境新加坡。⑩

由此可知，儘管新加坡和中共在九〇年代已加強雙方的政治及經濟關係，但新加坡仍願標明其反共的旗幟，而這個趨勢將持續下去。

二、區域的政治考慮

儘管很多人都認為新加坡可以在七〇年代中期或末期就應與中共建交，但除了共黨問題外，另一個就是東南亞區域的政治考慮，使得新加坡拖延了與中共建交的時間表。以華人為主要組成份子的新加坡，是處在一個對華人敏感度很高的地區——東南亞。一則是因為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都是以馬來人種為主，而新加坡則是以華人為主的儒教及佛教國家。

註⑦ 羅自Nayan Chanda and Tai Ming Chung, "Reef Knots," *FEER*, 30 August 1990, p. 11.

註⑧ 詳情請參考 Margaret Scott, "We Put It to You Again," *FEER*, 5 May 1988, pp. 16-17.

註⑨ Margaret Scott, "Pursuing All Connections," *FEER*, 9 June 1988, p. 14.

註⑩ N. Balakrishnan, "No olds barred," *FEER*, 7 February 1991, p. 28.

另一原因爲印尼及馬來西亞都曾深受中共所支持的共黨作亂之害（印尼更因此而與中共中止外交），因此這兩國對「華人」就深懷戒心及敵意。此外，華人在這二個回教國家的經濟上，佔有相當的霸權，亦造成當地人對華人的忌妒及仇恨，因而這兩國的排華運動，時有所聞。^①

新加坡處在這二大鄰國之間，其以「華人」爲主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就顯得格外的敏感，特別是在其與中共發展關係的事件上。因此之故，新加坡在很早就公開宣稱，它將是東南亞國協最後一個與中共建交的國家，^②以便取信於馬來西亞及印尼。新加坡的確守住了這項承諾，它在一九九〇年十月才與中共建交，在印尼與中共建交之後二個月。新加坡的這項諾言在過去曾被挑戰過好幾次。首先在一九七四年當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隨後菲律賓及泰國又於次年與中共建交；而新加坡在當時已與中共維持相當良好的政治及經濟關係，甚至比這三國都還要好。可是，新加坡並未跟隨他們的後塵。其次，一九七五年三月當時的新加坡外長 Mr. Rajaratnam 首度訪問中國大陸，當大家正揣測其動機時，Rajaratnam 重申新加坡在印尼之後與中共建交的立場。

一九七六年五月當李光耀總理首度以官方身份正式訪問中國大陸時，同樣的懷疑再度興起。印尼的一份報紙——*Merdeka* 甚至專論詢問：「新加坡是否真的會在印尼之後，才與中共建交？」^③當然，這個疑問很快就被澄清。李光耀後來在八〇年代的三次訪問中國大陸，同樣的揣測依舊不時的興起。然而，爲了顧及到東南亞的政治環境及其與印尼及大馬的關係，李光耀始終守著這個承諾，即使中共在過去一再向新加坡表達其建交的願望，^④而印尼也表示願尊重新加坡獨立外交的原則，但新加坡仍然堅持其與中共建交的時間表。

三、新加坡外交政策的特質

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都在運用「權力均衡」的理論，但是，新加坡可能是少數幾個運作這個理論最好的國家

註① 以印尼在一九六五年的排華運動爲例，不僅華人經營的商店遭到搗毀，印尼政府也全面禁止中文學校及中文刊物，使得華人子女只有在家裏才能學到中文教育及文化。

註② 這是指在印尼之後，才與中共建交。後來汶萊於一九八四年加入東協，至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才與中共建交。

註③ Stockwin, *op. cit.*, p. 14.

註④ 早在一九七五年當新加坡外長 Mr. Rajaratnam 訪問大陸時，中共當時的「外長」喬冠華就當面告訴他，只要新加坡覺得合適，中共願與其建交。（Arjun Senkuttuvan, "Lee for China to Exchange Views", *FEER*, April 23, 1976, p. 32）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九八九年中期，中共「外交部」的一位發言人表示：「中國願與新加坡在和平共存的五原則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共問題資料週刊，第三六二期，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五八至五九頁）

之一。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之下，在其全球政治上，很適當巧妙的運用超級強國來保護區域性的安全，並間接的維護新加坡本身的安全。^⑮在東南亞方面，以新加坡與以回教為主的印尼及馬來西亞處得相當不錯。即使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偶而有爭端（如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以色列總統訪問星洲），^⑯但兩國的整体關係仍是相當的和諧。至於和中共的關係發展上，新加坡更是很成功的應付兩個中國人的敵對政權，即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ROC）。前兩個例子超乎本文的範圍，現就分析新加坡的「兩個中國」政策，此為一明顯的例子，反映新加坡外交政策中，運用「權力均衡」的特有性格。

首先，幾乎所有的國家在面對政治力強大的中共及經濟力茁壯的中華民國時，都曾經歷過一段困難的時刻。過去所形成的建交模式，都是當一個被承認時，另一個就被迫退出；而中華民國大都是被放棄的那一個，因而外交關係就每下愈況。可是，對於所謂的「第三個中國」的新加坡而言，^⑰並沒有這個困難的時刻。

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以前，新加坡與海峽兩岸均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李光耀在此之前，曾經四度以官方身份正式訪問中國大陸，而李光耀訪問台灣的次數（包括所有公開及未公開的訪問），却至少二倍於此。^⑱相對地，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海峽兩岸的高層官員亦經常受邀訪問新加坡。李光耀和海峽兩岸高層人士維持的良好關係，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實。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於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訪問新加坡，這是中華民國總統第一次訪問一個與其沒有邦交的國家。李登輝總統的這次訪問顯現出兩個重大意義：一為中華民國與新加坡的良好關係，另一為李登輝總統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就任後所展現的「務實外交」行動。

即使在新加坡與中共建交之後，它仍與中華民國維持相當良好的實質關係。唯一的不同是，中華民國在新加坡的辦事處頭銜由「中華民國」改為「台北」，但辦事處的官員仍享受大部分的外交特權。事實上，在中共與新加坡建交後，李光耀於一九九〇年十月月底又再度訪問中華民國，這次訪問是緊接著他的中國大陸行之後，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底，中華民國行政院郝柏村院長，亦以「渡假」的方式造訪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並沒有像它對其他國家一樣，向新加坡政府抗議郝院長

註⑮ 例如，新加坡為了保護其本身及東南亞的區域安全，一直都主張美軍應繼續駐紮在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最近，新加坡甚至不顧印尼及大馬的反對，允准美國海空軍使用其原本就已相當有限的土地。

註⑯ 詳情請閱 Michael Leiter, "Israel's President in Singapore: Political Catalysis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 No. 4, 1988, pp. 341~352.

註⑰ 「第二個中國」係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但是，台灣及新加坡都不喜歡這個別號。

註⑱ 例如，李光耀在一九七六年五月首度訪問中國大陸前，他就已經秘密的到過台灣三次。（Sekutuvan, *op. cit.*, p.32）

的訪問。^{①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郝院長四天的新加坡訪問，僅僅是在中共首任駐新加坡大使張青到任後的幾天而已。當郝院長回到台北後，在記者會上，他強調：以「渡假方式，官方實質接觸」的模式與中華民國沒有邦交的國家發展關係，是很可行的。^{②⑩}

此外，在沒有正式邦交的情形下，新加坡與中共及中華民國都建立了相當良好的各種交流，這種良好關係甚至比有邦交國家之間的關係，還要更好。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中共在經營的百貨店提供較廉價的民生日用品（如食物，衣物及五金用品等），這些貨物遠比其他西方人經營的店所賣之物還要便宜，如此就使得新加坡人的工資與美日相比較，就更具競爭性。^{②⑪}而新加坡在中共開放門戶後，亦藉著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及貿易，而有助於其現代化。至於新加坡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亦不在話下。甚至連最敏感的軍事合作（新加坡軍人藉「星光計畫」已在台灣受訓長達二十年），新加坡仍有意繼續維持，並且似已得到中共的諒解。李鵬在一九九〇年八月訪問新加坡時，就曾被記者問到此一問題。他回答說：「中國尊重新加坡在這件事上的決定。……新加坡軍人在台灣接受訓練是個事實，但我們不必關心太多。」^{②⑫}

由此觀之，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被「中國問題」所困擾的國家；不僅如此，它還能與海峽兩岸的敵對政權相處得很好。這當然包括許多因素，如新加坡的經濟成就，它的中國文化的本質，李光耀卓越的領導，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新加坡外交政策中運用「權力均衡」理論的傑出表現。

叁、新加坡及中共政治及經濟關係發展的演進

根據新加坡對中共發展關係的三個要素，現將介紹兩國在過去及九〇年代政治及經濟關係演進的四個時期。

一、一九六〇年代：分離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就政治關係而言，新加坡就像其他東協國家一樣，在六〇年代對中共相當排斥。中共在六〇年代亦遭逢到巨大的政治衝

註①⑨

最近的例子是中共向菲律賓的抗議。柯拉蓉總統本有意於一九九一年初訪問台灣，除了接受輔仁大學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外，並準備與中華民國訂定一項貸款援助協定。但由於中共的強烈抗議，使得柯拉蓉總統這次很有可能的「歷史行」成爲泡影。

註②⑩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一月一日，第二頁。

註②⑪

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因爲工資低，吸引外資的機會就很大，因而有助於經濟發展。（"Astride on the road to Peking", FEER, March 7, 1975, p. 32.

註②⑫

譯自 Asian Bulletin, October, 1990, p. 30.

擊，以致影響其對東南亞的政策。首先是在六〇年代初期與蘇聯絕裂，隨後又發生文化大革命，以致在中共內部引發一場路線之爭。在「反蘇修」與「反美帝」的旗幟之下，中共加強對第三世界共黨的援助，以對抗美、蘇兩大強權。在中共「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二分法之下，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東協各國政府，就被視為中共的「敵人」。

就剛獨立的新加坡政府而言，在一九六〇年代最關切的問題就是內部的穩定及安全。然而中共的革命路線却使新加坡在六〇年代遭到共黨嚴重的騷擾。在當時，共黨份子主要係來自馬來亞共產黨。許多中下階層的華人，為響應共產祖國的號召，紛紛加入馬共以對抗執政的合法政權。例如在六〇年代末期，新加坡的左傾組織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sialis*）就正式宣佈退出國會，以武裝鬥爭從事革命運動。^②為了求生存，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從此開始實施嚴格的控制措施，以對付共黨潛在的威脅。理由很簡單，剛獨立而且脆弱的新加坡，無法承受任何有害於其國內安全與穩定的任何事件。因此之故，六〇年代的新加坡，對於以輸出武裝革命為導向的中共，並無好感。

然而，新加坡與中共在政治上的緊張關係，並沒有反應在雙方的經濟關係之上。雖然沒有正式的邦交，新加坡及中共在六〇年代的經濟來往，却相當的通暢。根據資料顯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在六〇年代，已是中共的第四大貿易伙伴，亦是中共在東南亞的最大市場。^③就新加坡而言，理由很簡單，貿易是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只要兩國的貿易交流，有益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都是可被接受的。在李光耀的傑出領導之下，這種政治及經濟分離的模式，應該也算是一種「權力均衡」的運用。

二、一九七〇年代：自信的新加坡與轉變中的中共

新加坡與中共在七〇年代的政治及經濟關係，已逐漸穩定而提昇到進一層的發展。有幾件事可以顯明這種趨勢。首先，新加坡在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對於中國代表權的表決事上，投下贊成中共取代中華民國的一票。新加坡的這一舉動，雖不表示將與台灣斷絕關係，但却博得中共的好感與信任。其次，在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大陸之後，中共即加強與東協的交往，並先後於七〇年代中期與大馬、菲律賓及泰國建交；在東協唯一未與中共建交的就是印尼及新加坡。一九七五年三月，新加坡當時的外長 Mr. Sinnathamby Rajaratnam 終於首開訪問中國大陸的記錄。這項邀請是由中共前「外長」

註② 詳情請閱 "Give up illusion f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hold up the great red banner of armed struggle," in *Parta! Rakyat Negeri Singapura*, 10 October 1968, pp. 3-5.

註③ 自一九六五年到六〇年代的末期，日本、香港、西德及新加坡、馬來西亞一直都是中共的四大貿易國。（Feng-Hua Mah, *The Foreign Trade of Mainland Chin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6）

喬冠華於一九七四年在聯合國所提出的。

一九七六年五月當李光耀總理正式以官方身份訪問中國大陸時，雙方的關係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²⁵儘管在七〇年代，新加坡和其他東協國家一樣，對中共的「黨對黨」政策，仍深表不滿，但此時的新加坡已因其在經濟的成就，而逐漸建立自信心。例如，在李光耀二星期的訪問中，他有意無意的展現出他的信心及驕傲；在其最後的公開演講中，他提到：

「當我帶著難得的經驗回到新加坡時，……我將因著新加坡不同的情況及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更有信心。我們雖然大多是擁有中國人血統的人，但是我們的發展却不同，因為我們在一個不同的環境裏，創造出一個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要承認，所有我的代表團成員，都認為我們有著不同的步調及不同的生活方式。」²⁶

李光耀的這次訪問之後，帶動了雙方高層官員的互訪，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首次訪問新加坡。那時身為「副總理」的鄧小平，是中共在七〇年代訪問星洲的最高階官員。鄧的歷史行加強了雙方的關係，並奠定雙方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發展基礎。

就經濟而言，中共與新加坡的雙邊貿易在一九七〇年代，仍持續的成長；貿易額由一九七〇年的美金一億四千六百二十八萬元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美金四億零一百一十五萬元。新加坡與中共的經貿關係，很明顯的遠甚於雙方的政治關係。在一九七五年 Mr. Rajaratnam 訪問中國大陸之前，新加坡就已允准中國大陸的「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在星島設立分行；其不僅負責雙方的貿易事務，並擔負雙方政府間聯絡的機構功能。在 Rajaratnam 的這趟大陸行，有二位重要的官員隨行，一位是 Howe Yoong Chong (當時為新加坡港務局負責人及新加坡發展銀行主席)，另一位為 T. F. Tang (當時為新加坡經濟委員會的主席)。由此可知，Rajaratnam 的這次中國大陸行，除了商談雙方的政治事務外，亦包括相當高層次的經貿問題。例如，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缺乏精密的煉油設備及技術，而新加坡在這方面却已很先進。²⁷這次由於 Howe Yoong Chong 的隨行訪問，奠下了新加坡港務局在以後幫助中共煉油發展的基礎。

新加坡與中共的雙邊經貿關係，在中國大陸於一九七九年宣佈對外開放政策後，就更進一步的加深。中共為了復甦其經濟及加速現代化，自七〇年代末期起，即積極尋求國外的援助，包括投資、技術、管理及資金等。新加坡對中共的重要性，若與日本、美國、及西德相比，當然微不足道。但是，若從東南亞區域而言，新加坡是中共在東南亞的最大貿易伙伴，而

²⁵ 李光耀的這次歷史性訪問，其實是經過中共好幾次的邀請後才兌現的。(Harvey Stockwin, "Lee: pathfinding in the forbidden City," FEER, 14 May 1976, p. 23)

²⁶ 譯自 Stockwin, "Lee lays it on the line," FEER, 4 June 1976, p. 14。

²⁷ "A Stride on the road to Peking," FEER, 7 March 1975, p. 32。

且又擁有眾多的華裔企業家、銀行家及商人，因此對中共的重要性，自不在話下。最後，新加坡與中共在一九七九年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使得雙方的貿易走向制度化的軌道，並奠下雙方在八〇年代發展的基礎。

三、一九八〇年代：穩定發展的新加坡與中共關係

新加坡與中共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政治及經濟關係更加親密，而趨於穩定。雙方高層官員的互訪更加頻繁，例如李光耀個人就在八〇年代三度訪問中國大陸，而中共領導人如黃華、趙紫陽、吳學謙、魏育民及古穆等都在八〇年代訪問過星島，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李光耀的中國大陸行，都受到中共隆重的官式接待，甚至比有邦交元首的訪問還要更熱烈。李光耀每次都與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談。儘管沒有正式建交，但雙方高層官員的互訪，絲毫未受影響。當經濟力茁壯的新加坡在區域政治上逐漸展現其影響力時，政治力強大的中共，亦愈發重視這個在其後門的東協國家。

雙方在八〇年代的政治關係，仍以共黨問題為主要的話題。然而此時却偏重在越南的人侵高棉，而非以往的馬共。²⁸事實上，由於中共及東南亞各國都視越南為最大的潛在威脅，因此，高棉問題使得二者合作的關係加深。儘管中共與東協仍有歧見，但二者均有一共同目標，就是將越南逐出高棉。因此之故，中共與東協在八〇年代在外交上，就表現相當一致，共同對抗越南。²⁹然而，新加坡儘管是東協最小的國家，却在中共與東協之間，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中共亦傾向於透過新加坡而傳達其訊息，特別是透過李光耀總理。例如在一九八五年一月，當吳學謙訪問新加坡時，當他被記者問到高棉問題時，他就強調中共和新加坡一致的立場，並保證中共將和東協國家發展友誼及合作關係。³⁰

此外，新加坡亦在中共與印尼之間扮演著橋樑角色。新加坡和印尼一樣，在八〇年代均未與中共建立邦交。但不同的是，新加坡官員經常訪問中國大陸，而印尼官員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前，從未訪問過中國大陸。而中共却經常向印尼表達復交的意願，與雙方關係均良好的新加坡，就因此而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中共與印尼終於在新加坡簽了一項有關雙方直接貿易的備忘錄。此為雙方自一九六七年中止外交關係以來，第一次政府間的正式接觸。後來在同年七月底，第一個在印尼政府仍抵制情況之下的貿易代表團，正式訪問中國大陸，並與姚依林會談，奠下雙方以後直接貿易及恢復邦交的基礎。

新加坡與中共在政治上的和諧關係，只是表現銅板的一面；雙方的經濟關係，在八〇年代的進展更是快速。新加坡與中共在一九八一年尾，首度正式交換貿易代表，常駐在對方，此為根據同年七月六日所簽訂的貿易協定。很明顯的，這是雙方

註28 馬共在八〇年代的威脅已逐漸淡化，但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領導人，仍不時的要求中共公開宣佈放棄其與東南亞共黨的連繫。

註29 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有一一七票支持東協所提的高棉問題解決方案。這是自一九七九年該方案提出以來，支持票數最多的一次。

註30 *China Quarterly*, (1985), p. 379.

加強貿易關係的最佳表徵。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新加坡的前任副總理吳慶瑞於一九八五年二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國大陸經濟特區發展的顧問。吳慶瑞曾是新加坡最早的企業——Jurong Town Corporation的負責人，他亦是新加坡經濟發展過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與李光耀同樣都是屬於星島第一代的領導人。吳的任命顯然係針對中國大陸於一九八四年中期，所開放的十四個沿岸城市及海南島，藉著他的任命及經驗；以助中國大陸發展經濟特區。

在八〇年代最具重要性的是李光耀於一九八五年九月的中國大陸行。這次的訪問中，除了與鄧小平及趙紫陽商談區域性的政治問題外，李光耀所率領的廿九人代表團亦和中共的經貿官員商談雙方的經貿問題。在這次成功的訪問，中共及新加坡皆獲得幾項承諾。例如中共答應新加坡願再加強雙方的貿易；允許新加坡航空公司在中國大陸的幾個省份城市的降落權；及允諾在未來的三年內，每天供應六萬桶原油給新加坡提煉。^⑳相對地，新加坡也答應擴大銀行服務，以利雙邊的貿易；提供有關造船、塑膠及成衣的機器及原廠買賣；允諾加強在中國大陸的旅館、旅遊及航空的投資與服務；及加強提供港口管理及煉油設備的服務。^㉑此外，在李光耀這次的訪問中，雙方亦同意設立一個對等的政府聯絡機構，以加強合作關係；同時雙方亦同意簽訂一項保證投資協定。後來在同年的十一月廿一日，新加坡及中共簽訂了一項投資保證協定；而在一九八六年三月，雙方又簽定了一個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如此，使得雙方的經貿關係，又向前邁入一個新的領域。

新加坡與中共在八〇年代緊密的經貿關係，亦可由下列幾件事反映出來。首先，雙方的貿易額由一九八〇年的美金六億一千零七十六萬元增加到一九八九年的美金卅一億九千零七十三萬元。中國大陸經由香港到新加坡的間接貿易亦有明顯的增加，從一九八〇年的港幣六億七千六百六十萬元增加到一九八九年的港幣七十一億九千一百二十萬元。^㉒其次，新加坡於八〇年代期間在中國大陸直接及間接的投資，亦是相當的可觀，以一九八五年為例，根據中共在新加坡的代表指出，有三十家以上的新加坡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其資金超過美金四億元以上；而另一則報導指出，新加坡的投資金額超過美金五億元，涵蓋四十六件計畫。^㉓其中最大的計畫案是由 Wannian 財團所負責，他們在深圳特區內投資一項高達美金一億八千二百萬元的貨櫃及冷凍庫的大型建築。在一九八八年以前，據估計新加坡在大陸的投資已達美金八億三千萬元，此為在中國大陸的第四大投資者。^㉔由於新加坡不斷增加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使得雙方在八〇年代的每一個月幾乎都會簽訂二個至三個與投資有關的協定。

註⑳ V. G. Kulkarni, "Hot on a new trail," *FEER*, 10 October 1985, pp. 106-107.

註㉑ Kulkarni, *op. cit.*, pp. 106-107.

註㉒ *China Trade Report*, May 1987, p. 16 and June 1990, p. 16.

註㉓ Kulkarni, *op. cit.*, p. 107.

註㉔ 中共問題資料週刊，第三三四期，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第四二頁。

此外，新加坡與中共在金融方面的聯繫網，在八〇年代也有明顯的增長。目前新加坡四大銀行中的三個，都在中國大陸設有分行及辦事處。他們是Overseas Union Bank（在北平及深圳設有分行）、United Overseas Bank（在北平及廈門設有分行），及Overseas -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在北平設有分行）。在一九八〇年中期，這三家銀行和另七家在新加坡的外國銀行，聯合貸款星幣八千二百萬元給在上海的Mao Hai聯合公司及在香港的中央銀行投資公司，以資助其興建在上海的一個五星級旅館。³⁶同樣地，中國大陸目前至少也有兩家銀行在新加坡設有分行（即中國銀行及廣東省銀行）。這些金融機構的設立，當然有益於雙方的經濟活動。

由於金融機構的增加，雙方的進出口公司在八〇年代亦跟著相繼在對方設立分公司。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為例，中國大陸就有二家進出口公司分別在新加坡設立子公司。到目前為止，據估計中國大陸至少有五家進出口公司在新加坡設有分公司，分別負責有關機械、五金、化工、紡織，及食品等業務。實際上，不僅如此，身為東南亞最大的貿易轉口港，新加坡亦是中國大陸在此地區的最大貨物及產品展示中心。例如，在一九八七年，中國大陸就有兩個大型及四個小型的展覽會，在新加坡舉行。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新加坡在八〇年代的旅遊訪問，亦明顯的增加。除了高層官員頻仍的互訪外，一般人民的旅遊訪問，亦相對的增加許多。根據中共的官方統計，在一九八二年，有二萬二千餘次的新加坡人訪問中國大陸，這個數字在一九八四年時，增加到三萬七千餘人次，一九八八年時則已超過六萬人次。³⁷儘管中國大陸到新加坡的人數沒有那麼多，但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若以人口結構而論，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由中國大陸到新加坡的訪客中，其中的六四％是為商業會談，十九％是參觀訪問工業及企業界，十五％是到新加坡投資及設廠的，另外的二％是政府官員的訪問。³⁸這項統計資料顯示，大多數到星島的中國大陸客都是與從事商業及貿易有關，此亦說明雙方經濟關係成長的因素之一。

最後，新加坡與中共在八〇年代的交通網路，亦逐漸加強。雙方除了在了一九八五年當李光耀訪問中國大陸時，簽訂了一項航空協定，雙方又在一九八九年一月簽訂了一個海洋協定。根據這項協定，所有停泊在中國大陸港口的的新加坡船隻，可以享受免除貨物稅的優待，及擁有優先停泊中國大陸港口的權利。此外，這個海洋協定又賦予雙方的船隻，享有最惠國待遇。³⁹這些交通上的便利，當然有助於雙邊經濟及貿易的往來。

³⁶ Yuanyang Gu, "China - Singapore Economic Relations," in Siow - Yue Chia and Bifan Cheng (ed.), *ASEAN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p. 133.

³⁷ Hung - Yu Chen, "China's Political Division and Chinese Communists in Southeast Asi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7, No. 4, April 1991, p. 79.

³⁸ Gu, *op. cit.*, p. 195.

³⁹ 中共問題資料週刊，第三五二期，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第四二頁。

四、一九九〇年代：全面發展的新加坡與中共政經關係

根據雙方在過去已經建立的良好交流管道，新加坡與中共在九〇年代勢必會再加強雙邊的關係。有幾個理由可說明之。第一，新加坡與中共終於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儘管雙方在建交前，已經建立了各種的良好雙邊交流，但雙方的建交，仍具有某些實質的意義。就中共而言，它幾乎已完成了對東協關係正常化的行動，象徵著其勢力進一步延伸到東南亞地區。就新加坡而言，在新任總理吳作棟的領導之下，這正是其展示發展獨立自主外交的時刻。雙方關係的正常化，幾乎已清除了雙方之間所有的障礙，使得雙方未來的關係更趨明朗。

其次，美蘇的冷戰結束及中（共）蘇的復合，亦有益於新加坡與中共未來的關係。儘管強權國家與弱小國家之間的關係，常被比喻為大象與小草之間的關係（即不論大象們是在作愛或打架，小草都受到波及），^{④①}但九〇年代的國際關係已有明顯的不同。在過去，三個強權（即美、蘇及中共）都在利用第三者以對付第二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對抗的。而今天，蘇聯及中共都在集中心力以解決其國內問題，而非運用以前的「聯合陣線」策略，向外發展。即使是越南，這個曾經在八〇年代造成東南亞嚴重威脅的國家，現在亦積極尋求外國的援助，以復甦其日益衰退的經濟。因此，在九〇年代，可以預見的是，全球的趨勢將由政治和解及經濟合作所主導；而新加坡與中共的關係，亦將不會遠離此一主流趨勢。

再者，從中共的觀點而言，其與新加坡的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亦是相當的樂觀。一九八九年六月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雖然震驚了世界，但是這個悲劇並未影響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共亦表明將繼續加強其與世界各國，尤其是太平洋區域的經濟合作關係。從八〇年代後期發生的幾件事，可以顯現出中共的這項趨勢。其一是亞洲開發銀行於一九八六年三月正式接受中共為會員國，提供中國大陸另一個經濟發展的財力資源。其二，是在當年底北平舉行了一次「亞太經濟邁向二千年」的研討會，這是由三個機構所贊助，並獲得中共政府的大力支助。^{④②}在此研討會的開幕典禮上，當時的中共總理趙紫陽說：

「中國政府對亞太經濟合作的基本立場是：互相尊重、加強互動、平等及互惠，及聯合發展。我們的十四個經濟發展區，四個經濟特區，及三個開放區域都是座落在太平洋沿岸。這個地點是有助於加強我們與太平洋各國的關係」。^{④③}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在北平會議之後，中共即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是於一九八三年

註④① 這個比喻最早是出自李光耀總理，他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曾說過：「當大象們在打架時，小草受到蹂躪；當大象們在作愛時，小草亦受到蹂躪。」（譯自

註④② Shibusawa Masahide, *Japan and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London: Groom Helm,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4, pp. 4~5）。

註④③ 這三個贊助機構是亞太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及國務院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註④④ *People's Daily*, November 13, 1986.

三月創立的，自此即成爲太平洋地區最蓬勃發展的組織。中共的代表團是由宦鄉（中國大陸知名經濟學家）所領導，並參加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在加拿大溫哥華所舉辦的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第五次年會。在宦鄉的演說中，他指出中國大陸的全球門戶政策是以太平洋爲導向，如果沒有此地區，中國大陸的經濟不可能有任何的發展。^④後來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宦鄉（同年六月被任命爲「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的主席）在「太平洋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的研討會上致詞說：

「中國與太平洋區域的經濟互動與合作可以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不僅是在質與量方面，而且是在長與寬方面。……中國實施一個獨立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太平洋地區透過經濟及外交活動，中國不僅可以拓展及加深其與這個地區的經濟、貿易及技術合作，而且毫無疑問的，可以提昇這個地區的穩定及和平。」^④

在天安門慘劇發生後，當舉世正懷疑中共的經濟改革政策時，中共的保守派領袖很快的便澄清這個疑慮，並保證將繼續執行其不會改變的對外開放政策。例如在一九九〇年，中共立即付諸行動，實施了幾項政策，包括四月份人大通過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四月新開放上海浦東經濟特區，五月份將山東濟南劃入爲沿海經濟開放區，及制定兩項爲鼓勵投資而關於土地租賃及移轉的法律。^⑤所有這些政策及法案，都給予外來投資者，提供更好的環境及條件。以中外合資法（Joint Venture Law）爲例，爲了獎勵投資，中外合資已無期間的限制，而且外國投資者，現在可以成爲聯合投資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即董事長）。^⑥當然，中共本身也有一些嚴重的問題（例如無效率的官僚體系，生產力低，及不健全的產業結構等），這些都可能使外來投資者裹足不前；^⑦但是，一般而言，中共在一九九〇年所實施的幾項政策，可以看出其欲與世界各國繼續發展經濟合作關係的趨勢。

除此之外，中共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李鵬及姚依林等，都曾一再強調中共繼續不變的對外開放及經濟改革政策。最近一次的官方言論，可見於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沈覺人的文章，他指出：

「中國將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切實抓好農業；努力提高工業的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切實加強基礎產業；進一步理順價格體系；穩定市場和物價，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⑧

註④ Akira Chiba, "Pacific Cooperation and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 No. 1, 1989, p. 51.

註⑤ *World Economic Herald*, August 17, 1987.

註⑥ 關於土地的法律爲「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及「外商投資開發經營成片土地暫行管理辦法」。

註⑦ Chiu-yuan Cheng,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Asian Outlook*, Vol. 26, No. 1, November - December 1990, pp. 36-37.

註⑧ 有關中共經濟問題的分析，請參考 "Economic Crisis looms," *Inside China Mainland*, March 1991, pp. 1-5.

註⑨ 沈覺人，「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及其基本政策」，中國對外貿易（中共），第一六五期，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二頁。

很明顯的，由此可知幾乎大部分的中共領導人，都願繼續執行其經濟改革政策，這項政策當然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亞洲各國的歡迎。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對亞洲各國而言，不僅表示經濟合作關係的提昇而已，亦象徵着政治的穩定。這就是中共在九〇年代對東南亞政治及經濟關係發展的趨勢。

事實上，自一九九〇年初起，當冷戰結束及中（共）、蘇和解後，中共亦已開始加強其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例如，關於爭議性很高的南沙群島主權問題，中共目前的態度是，致力於與東南亞各國合作開發油源豐富的南沙群島，而不再在主權問題上起爭執。其次，關於高棉問題的立場，中共最近也不停的向赤棉施壓力，要其接受由東協所提出的和平方案；這些舉動不僅受到東協各國歡迎，亦進一步改善及增進中共與東協的關係。^④最後，中共「總理」李鵬在一九九〇年的後半期，先後訪問東南亞兩次，行程涵蓋了東協所有的國家（汶萊除外）。李鵬首先於一九九〇年八月訪問印尼、新加坡及泰國，爾後又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訪問馬來西亞、菲律賓、寮國及斯里蘭卡。李鵬的這趟東南亞之行，已為中共與東南亞在九〇年代的關係，鋪下坦途。

肆、結 論

從地理位置而言，新加坡離中國大陸相當遙遠；但身為東南亞最大的國際港及扼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之咽喉，新加坡顯然對東亞（包括中國大陸）國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就政治而言，一個像新加坡的小國家對於一個身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共而言，似乎在其國際政治上並不具重要性；但是就區域政治而言，由華裔人口所組成的新加坡，已逐漸顯示其在東南亞地區對中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經濟層面而論，新加坡在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對中共的經濟發展並無影響力；但自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當中共逐漸向西方靠攏時，新加坡對中共的經貿角色即逐漸加強。尤其自七〇年代末，當中國大陸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以來，身為東南亞最現代化國家的新加坡，對中共的經濟發展就愈顯得重要。

本文已闡釋新加坡對中共發展關係的三個要素，即共黨問題、區域政治的考量，及新加坡特有的外交性格。在過去的三十年，新加坡及中共的關係發展，即被這些相互影響的因素而主導。過去雙方關係發展的軌跡已顯明，新加坡與中共已由六〇年代的政治猜疑轉變到七〇年代的經濟互惠，而更進展到八〇年代的政治及經濟的合作關係。

因此，就雙方過去已建立的良好交流管道，中共在九〇年代的政治及經濟發展趨勢，及新加坡在東南亞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再加上雙方於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雙邊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繼續加強。

註④ Nate Thayer, "A Khmer Ruse," *FEER*, 7 March 1991, pp. 25-26.